



武漢大學
百年名典

唐人絕句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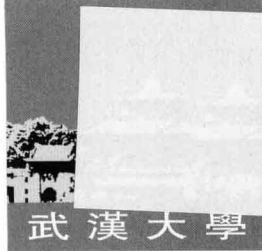
劉永濟 選釋



根澹葉茂 實亦聲洪
山高水長 流嵐昆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漢大學出版社



武漢大學
百年名典

唐人絕句精華

■ 劉永濟選釋



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人絕句精華/劉永濟選釋.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3. 11
武漢大學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12013-6

I. 唐… II. 劉… III. 絕句—詩集—中國—唐代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56330 號

責任編輯: 胡程立 責任校對: 劉 欣 版式設計: 馬 佳

出版發行: **武漢大學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電子郵件: cbs22@whu.edu.cn 網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20 × 1000 1/16 印張: 28.75 字數: 410 千字 插頁: 5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013-6 定價: 72.00 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凡購我社的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當地圖書銷售部門聯系調換。

劉永濟

(1887—1966)，字弘度，號誦帚、知秋翁，室名易簡齋、微睇室、誦帚庵。湖南新寧人。幼承家學，耽習文史。二十歲出湘，先後考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天津高等工業學校、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就讀。後在上海自學有年，嘗從朱祖謀、況周頤研習詞學。三十歲時回長沙明德學校執教，十年後任東北大學國文系教授。“九·一八”事變不久，被國立武漢大學聘為教授。在武漢大學長期擔任文學院院長、文科研究所主任，兼《文哲季刊》編輯部主任，幾度以院長身份代理校務。1949年以後，任中文系文學史教研組主任、武漢市政協常委、湖北省文聯副主席、《文學研究》編委。1956年被評為一級教授。

劉永濟是武漢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極為重要的奠基人和引路人之一，被譽為“五老”之首。他是中文系弘毅、篤實、尚真、求精傳統學風的重要締造者和體現者之一，許多著作都是厚積薄發，言簡意賅，經過多年的“打磨”（有的長達30年）才問世的。所著《文學論》、《十四朝文學要略》、《屈賦通箋》、《箋屈餘義》、《屈賦音注詳解》、《屈賦釋詞》、《詞論》、《宋詞聲律探原大綱》、《唐五代兩宋詞簡析》、《微睇室說詞》、《文心雕龍校釋·附徵引文錄》、《唐樂府史綱要》、《元雜劇考》、《國風樂府合選》、《唐人絕句精華》、《宋代歌舞劇曲錄要》、《元人散曲選》以及《默識錄》等，幾乎無一

不是精品。每一書出，即在相關領域產生大的影響。如《文學論》，郭紹虞先生就是讀了它而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發生興趣的。

《文心雕龍校釋》被學人視為二十世紀“龍學”研究的四大基石之一。《屈賦通箋》則“于并世諸家中獨樹一幟”（程千帆語），《唐樂府史綱要》“是迄今為止，我國研究唐代樂府歷史的唯一專著”（同上），《詞論》是“二十世紀，中國詞學由傳統向現代化推進”的代表作（施議對語）。總之，劉永濟的學術研究，涵蓋古代文學諸多領域，每項研究都有獨到之處，而對“龍學”、屈賦和唐宋韻文的研究貢獻最大，他不愧為二十世紀古代文學研究的頂級專家。

劉永濟治古代文學，強調“知”、“能”的統一，故其持論有識，擅長詩文寫作。所著《運巢詩存》、《誦帚庵詞》，流播海內，久為專家所稱。其詞尤負盛名，繆鉞即謂其“沉健深摯”，“蕃艷其外，醇至其內”。朱光潛則激賞其融合衆家以成一家的風骨美，言其“諧婉”、“明快”、“冷峭”，洗盡鉛華，深秀在骨，是猶永嘉之未聞正始之音也”。大抵先生填詞，頗得朱、况真傳，“能用方筆”（朱祖謀語），發危苦之音而出以沉雄之氣，亦在在顯出先生的大師風采。



劉永濟教授全家福（1934年于珞珈山）

十年不見頭俱白千里相存眼尚
青試問詩情定何似恰如楸
桂老彌馨

兩僧老兄由渝來漢遠相存問
感賦小詩即希

晒心 弟永濟上書

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三日



劉永濟教授詩札

《武漢大學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漢大學，走過的是學術傳承、學術發展和學術創新的輝煌路程；世紀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學者大師們學術風範、學術精神和學術風格的潤澤。在武漢大學發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學者和學術大師在這裏辛勤耕耘，教書育人，著書立說。他們在學術上精品、上品紛呈，有的在繼承傳統中開創新論，有的集衆家之說而獨成一派，也有的學貫中西而獨領風騷，還有的因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而開學術學科先河。所有這些，構成了武漢大學百年學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學術底蘊。

武漢大學歷年累積的學術精品、上品，不僅凸現了武漢大學“自強、弘毅、求是、拓新”的學術風格和學術風範，而且也豐富了武漢大學“自強、弘毅、求是、拓新”的學術氣派和學術精神；不僅深刻反映了武漢大學有過的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輝煌的學術成就，而且也從多方面映現了20世紀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成就。高等學府，自當以學者為敬，以學術為尊，以學風為重；自當在尊重不同學術成就中增進學術繁榮，在包容不同學術觀點中提升學術品質。為此，我們縱覽武漢大學百年學術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華，結集出版，是為《武漢大學百年名典》。

“根深葉茂，實大聲洪。山高水長，流風甚美。”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為武漢大學校慶題寫的詩句，長期以來為武漢大學師生傳頌。我們以此詩句為《武漢大學百年名典》的封面題詞，實是希望武漢大學留存的那些澤被當時、惠及後人的學術精品、上品，能在現時代得到更為廣泛的發揚和傳承；實是希望《武漢大學百年名典》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為中華優秀文化的積累和當代中國學術的繁榮有所建樹。

出版說明

本書據中華書局 2010 年版《唐人絕句精華》校訂重排，此次收入《武漢大學百年名典》出版，僅對個別字、詞、標點錯誤作了修正，力求保持原貌，以資紀念。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緣起及取捨標準

甲、緣起 我自一九五九年夏患風濕性關節炎後，不良於行，承大學黨委關注，暫不開課。但我自考慮，雖一時行動艱難，然坐着做研究工作是無妨的，因念王士禎的《唐人萬首絕句選》一書流行雖久，今日讀之，尚有當改選之處，久思新選一書而無暇，何不趁此時爲之。考王氏素以神韻之說爲詩家倡。其說出於司空圖、嚴羽兩家，曾編《唐賢三昧集》以張其說^[1]。雖人多宗仰，目爲大家，而過求空靈，過矜修飾，以吞吐爲風致，其流弊所至，遂有“膚廓”與“縹緲無著”之譏^[2]。一時詩家如趙執信即援引其前馮班之說以斥其非，並專著《談龍》一書，抨擊甚力^[3]。他如施閏章、沈德潛、蔣士銓、宋犖、袁枚、紀昀諸人，均有不滿的批評。趙氏《談龍錄》既反對王氏稱作詩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復反對其詩中無人，“人人可用，處處可移”；又引《金史·文藝傳》周昂的話反對“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皆中王氏要害^[4]。至施閏章與王氏交誼很好，然施嘗語王門人洪昇曰：“爾師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吾詩如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則亦不滿其縹緲不著實之論也。蔣士銓《忠雅堂集》卷二十六有《論詩雜詠》三十首。其論王詩曰：“蘭麝繞珠翠，美人在金屋。若使侍姬妾，未免修眉蹙。唐賢臨晉書，真意苦不足。”又卷十八有《說詩一首示翰泉》，其略曰：“同時王新城，俗士群相推。聲色豈不佳，但襲毛與皮。秋谷撰《談龍》，嫚罵頗有宜。”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序》曰：“新城王阮亭尚書選《唐賢三昧集》，取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掛角，無迹可求’之意，蓋味在鹹酸外也，而於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宋犖《漫堂說詩》亦有與沈相同之論曰：

“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桃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鰲擲鯨吐，尚有未逮。”袁枚《隨園詩話》中評王之語極多，其卷二第三十八條有曰：“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毀之者亦損其真。須知先生才本清雅，氣少排異，為王孟韋柳則有餘，為李杜韓蘇則不足也。”此論尚平允。其卷三第二十九條又曰：“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矣。或問：‘宋荔裳有絕代消魂王阮亭之說^[5]，其果然否？’余應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當使人敬，使人感且興，不必使人消魂也。然即以消魂論，阮亭之色，亦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者也，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熏海外之名香，傾動一時，原不為過。……’”此論則不免傷於輕薄，評文者不應如此，然“喜怒哀樂不真”之評，却非誣罔。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三《灤陽消夏錄》中，載益都李詞畹言：秋谷寓一家園中，夜方制一詩未成，窗外有人與之談話，因日與酬對，但其人不肯入室，且不道姓名。秋谷亦不深究，知為鬼魅，亦不畏懼。“秋谷與魅語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樹幽花，而無寸土菽五穀；如雕闌曲榭，池館宜人，而無寢室庇風雨；如彝鼎疊洗，斑斕滿几，而無釜甑供炊爨；如纂組錦綉，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釵，而無主婦司中饋。’”紀昀此文，假設鬼語，譏評王氏，亦猶蔣士銓、沈德潛、袁枚之意，謂其空飾外貌而乏內容，可美觀而不切實際，以古語評之則是言之無物，以今理論之則是形式主義也。然統觀諸家於王氏所以必取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與嚴羽“羚羊掛角，無迹可求”的原因所在，尚未能指出。我嘗從其所作詩歌及自編詩集中反復翫索，而後知王氏之倡為神韻說，從詩學的角度來說，固有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稱，與宋鞏《漫堂說詩》所論，乃以救清初學宋詩之弊的意思^[6]。就神韻說本身作為文學的一種理論來說，原亦非不可。但王氏之倡為此說，其思想深處，尚別有原因。蓋當清初，漢民族常思反抗，因之清廷對於其時知識分子猜

忌百端，文網至密。文人著述，即其所最注意之處，故每易觸其忌諱，甚至殺身滅族。而無耻之輩，輒以告密為進身之階。試考清初諸大文字之獄，不難知其鎮壓手段之殘酷。其中如康熙初年莊廷鑑之獄，為王氏親所聞見，自不能不有戒懼之心^[7]。考王氏生於明崇禎七年，明亡時方十一歲，照理未必有故國之思。但當明亡之時，其伯父曾壯烈殉國。而新城被清軍攻陷後，其家中人多有受害者。王氏母親亦險遭不測。王氏對此，必然印象甚深，感動甚大，故其二十四歲所作《秋柳》詩，即含憑弔亡明之意。《秋柳》詩中寓意甚深，尤顯著而易犯忌諱者，莫如詩前的《序》。《秋柳》詩原《序》有“僕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楊柳，同《小雅》之僕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遠者”等句。湘皋遠者，用屈原《九歌·湘夫人》篇“將以遺兮遠者”，暗中乃指明末逃亡的政府。至其“楊柳”、“僕夫”句，係用《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及《出車》“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兩處之語組合而成。試檢《小雅》此二篇《小序》，則觸犯清廷之處，大足招來大禍。《采薇》篇《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令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出車》篇則將率還師，歌以勞之也。此等詩語，如一告發，禍且莫測。故王氏後來諱莫如深。其刻《感舊集》時，竟將此《序》刪去，一種懼禍之心理，至為顯明。即其平生所作詩歌，凡有關當時政治良否、社會情狀，絕少反映，豈即所謂“不著一字”、“無迹可求”之義邪？然其全集中間有涉及民生疾苦之作，如《蠶租行》等^[8]，則皆對勞動人民缺乏真摯感情，無非只是旁觀者之嘆嗟而已。恰如袁枚所譏“喜怒哀樂之不真”，此則非可以司空圖與嚴羽之說為借口也。若其自編詩集，其中大部分係遊覽山川古迹之作，此等詩篇除運用典故，描繪景色，諧協聲律，敷設藻采，別無可觀，而尤可怪者，其自編詩集，特以歌頌統治者的《對酒》篇居首，命意何在，固極明顯。按管世銘《韞山堂詩集》卷十六有追記舊事詩一首曰：“詩無達詁最宜詳，詠物懷人取斷章。穿鑿一篇《秋柳》注，幾令耳食禍漁洋。”自注“秦人屈復注王漁洋《秋柳》詩，‘白下’、‘洛陽’、‘帝子’、‘公孫’等字妄擬為憑弔勝朝，最為穿鑿。”又按管又記一事曰：“丁未春大宗伯某

(彭元瑞乾隆丁未時官工部尚書，見《梵天廬叢錄》卷二十二)，倚撫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園次長短句語疵，奏請毀。事下機庭；時余甫內直，惟請將《曝書亭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宮中草》絕句，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礙。當路頗韙其議，奏上報可。”考乾隆丁未為五十二年，距王氏之歿七十餘年，尚有告發之者，若無管世銘為之回護，則禍作矣。管氏稱《秋柳》詩注穿鑿，正是為王回護，故有“耳食禍漁洋”之語。因此之故，王氏《唐人萬首絕句選》一書，雖多膾炙人口之作，然而反映當時政治以及勞動人民生活、諷刺統治階級的荒淫剝削諸詩，幾乎沒有（按王選雖也有些《宮怨》、《塞上》等曲，都是合於他的藝術觀點而入錄的）。此固由王氏本人的階級立場所決定，而王氏心中畏懼以文字取禍，亦占重要地位。我所謂今日讀之，尚覺有待改選之處，即在於此。

考王氏選此書時，乃七十五歲退居故鄉以後。其書凡例稱“每欲刪定宋洪氏《萬首絕句》，以其浩瀚，輒爾中輟，後二十年始成”。可見王氏對於刪定洪氏書之計劃，籌慮已久，至老方定。我乃取洪書細讀，於可以補充王選之作，悉行錄出，初稿得詩約千首，幾經增刪，及今作注釋時，乃釐定為七百八十八首。所錄比王選較少而內容充實過之，因遵毛主席“取其精華”的指導，名之曰《唐人絕句精華》。惟憑我個人一孔之見，是否尚有去取不當之處，仍乞國內詩家賜以指正，實為厚幸。

乙、去取標準 絕句在詩的各體中為最小，或以為截取五七言律詩中四句而成，絕非事實。其發生與發展在唐律之前，却與唐律同其盛概。觀郭茂倩《樂府詩集》第八十六卷以下所載民間歌謠，絕句的雛形已具，但當漢魏之際，絕句尚未定型，故每於五七言中雜以三四言之句，又不必皆為四句一章，或二句或三句或六句不等。及至晉宋以後，漸多四句一章之作，究與唐宋人絕句不同。故許學夷《詩源辯體》稱之為“五言四句”、“七言四句”，以別於唐宋絕句。是以論此體之成為定型及其豐富多彩，鬱成壯觀，却在李唐一代^[9]。我今所選大體亦不出洪邁的《萬首唐人絕句》一書。至於王氏《唐人萬首絕句

選·凡例》所稱新都楊氏的《絕句增奇》，我未之見，但參以宋趙章泉、韓澗泉《唐詩絕句精選》、元楊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詩品匯》第三十八至五十五卷絕句部分及明唐光允《唐詩拾遺》第四卷絕句部分，再加以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清代所編《全唐詩》、沈德潛《唐詩別裁》、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兩書的絕句部分、姚鼐《唐人絕句詩鈔》、王闈運《唐詩選》中絕句部分及近人邵裴子《唐詩絕句》，此外還參考諸家詩話中所論及的唐人絕句名作，如計有功《唐詩紀事》等，斟酌損益，幾經改定，唐人絕句之可選者，大體已具。

絕句之體裁雖小，詩家皆認為難工。蓋必作者的藝術手段甚高，概括力甚強，方能於區區四句之中，將客觀的事物反映在作者思想感情上最切要、最精彩的部分，或作者主觀中對於其所接觸的客觀事物有着最足以感動人的處所，概括出之，又或即使是小小景物或生活細節，皆人人意中所有而未嘗形之筆墨者，能寫來明白如話，光景猶新，讀者由其所已寫者可以推見其未寫者，由其部分可以推見其全體，即能於吟詠之餘，覺其情溢詞外，狀呈墨中，犁然有當於心，自能意味深長。劉禹錫所謂“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尤於絕句為至要之論。王氏論詩，謂“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亦於絕句為尤宜。趙氏以此論不全面，恐人但以一爪一鱗為龍，故反對之，實則二人之言可互相補充。絕句正以一爪一鱗為佳，不必全身畢露而全身具在，方為合作。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論文人摹繪物色，有“以少總多，情貌無遺”八字，今用以說明絕句的特色性，至為恰當。“以少”則一爪一鱗也，“無遺”則全身具在矣^[10]。李唐一代以詩歌取士，故其時作者輩出，詩學極盛，絕句一體亦即於此時呈燦爛之觀，不但作者眾多，作品繁富，其所涉及的範圍亦極為廣泛。讀洪氏《萬首唐人絕句》一書，真如入五都之市，神迷目眩。王氏因以嘆其浩瀚，不易刪定，誠非過論。今欲於此極眾多的作者，極繁富的作品，極廣泛的範圍中，取其精華，捨其糟粕，不可不先定一去取的標準。此種標準，粗略規定去取各十條列後。至宋賢以後詩話家、詩選家論絕句之語，今除間採入有關作品

之釋詞中外，並擇要附錄於本書之末，以供省覽。詩人小傳則列於一作者名下，略可考見其人生平，未能詳也。

取的標準：

1. 凡通過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當時政治、社會情況而加以批判者，如杜甫的《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呂溫的《早甚觀權門移芍藥》，李敬方的《汴河直進船》之類。

2. 凡描寫勞動人民生活或代其呼籲者，如陸龜蒙、曹鄴的《築城》，張碧的《農父》，來鵠、杜荀鶴的《蠶婦》，李紳的《古風》，聶夷中的《田家》之類。

3. 凡弔古、懷古之作可為當時統治者鑒戒者，如劉禹錫的《石頭城》、《臺城》，羅鄴的《汴河》，鮑溶的《隋宮》，李商隱的《北齊》、《齊宮》，陸龜蒙、皮日休的《館娃宮》之類。

4. 凡詠物之作而有所寄託者，如李益的《隋宮燕》，李商隱的《屏風》，羅隱的《金錢花》，韓偓的《觀鬥鷄》之類。

5. 凡代征人、征人婦、宮人，或為封建制度所壓迫的婦女抒寫怨思者，如李白的《玉階怨》，白居易的《閨怨》，王昌齡的《長信秋詞》，張籍的《鄰婦哭征夫》，盧綸的《逢病軍人》，陳陶的《隴西行》，以及諸家《塞上曲》、《塞下曲》、《王昭君》之類。

6. 凡摹繪山水，得其精神，或雖小小景物而寫來光景猶新，又可見作者體察自然之力及其胸襟氣概者，如王維的《輞川》諸作，李白的《望廬山瀑布》，暢當的《登鶴雀樓》，錢翊的《江行無題》之類。

7. 凡論詩或評詩人、弔詩人者，如杜甫的《戲為六絕句》，李商隱的《漫成》，杜牧的《讀韓杜集》，元稹的《酬李甫見贈》，戴叔倫的《題三閭大夫廟》，鄭谷的《讀前集》之類。又如描寫音樂、圖畫等作，亦間有採入。

8. 凡描地方風俗者，如劉禹錫的《竹枝》，白居易的《浪淘沙》，王叡的《祠漁山神女歌》，以及諸家的《江南曲》、《采蓮曲》之類。

9. 凡悼傷或贈別而具有真情者，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廣陵》，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元稹的《聞樂天授江州司馬》，李商隱的《散關遇雪》，陳去疾的《西上辭母墳》之類。

10. 凡已膾炙人口之作，今日讀之尚能引人入勝，而無不良影響者，如韋應物的《滁州西澗》，柳宗元的《江雪》，白居易的《問劉十九》，耿湋的《拜新月》，張繼的《楓橋夜泊》，杜牧的《秋夕》，韓偓的《已涼》之類。

捨的標準：

1. 凡尋常酬應，既無深意厚感，又不關民生國計者；
2. 凡事關個人昇沉，有嘆老嗟卑情緒者；
3. 凡描寫冶遊之事，帶有色情者；
4. 凡投贈僧道之作，帶有消極思想者；
5. 凡吟詠景物而無所寄託或不足以見作者胸襟者；
6. 凡頹廢放蕩，帶有感傷色彩者；
7. 凡頌揚統治階級或封建色彩太濃者；
8. 凡滑稽無賴或搬弄文字以為遊戲者；
9. 凡涉神仙鬼怪，帶有迷信傾向者；

10. 凡屬小說中虛構人物之作；但此類中亦有民間傳說，經文人潤色流傳者，不在此例。

[1] 王士禛論詩主神韻。其《池北偶談》卷十八載：“汾陽孔文谷（天胤）云：‘詩以達性情，然須清遠為尚。薛西原論詩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澗”，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辰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為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按據此則王氏前已有倡導者。又王士禛《唐賢三昧集·序》曰：“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按“羚羊掛角”出《傳燈錄》：“義存禪師謂眾曰：‘我若羚羊掛角，你向什麼處摸撲？’”）司空表聖論詩云：‘妙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宸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

[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趙執信《因園集》提要）曰：“平心而論，王以神韻縹緲為宗，趙以思路剗刻為主。王以規模關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

銳於王，而末派病於纖小。”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談龍錄》提要）曰：“王士禛與門人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趙執信因作此書以排之。大旨主於詩中有人，不當為縹緲無著之語，使人人可用，處處可移。其說足救新城末派之弊，似相反而實相成。”按《提要》以“膚廓”與“縹緲無著”之弊，歸之末派，實則王氏自身即有此失。

〔3〕馮班《嚴氏糾謬》曰：“滄浪論詩，止是浮光掠影，如有所見，其實脚跟未曾點地。故云盛唐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興在象外’一語妙絕。”按《嚴氏糾謬》係馮著《鈍吟雜錄》中之一卷。王氏《唐賢三昧集·序》首引嚴說，故馮雖非糾王，糾嚴即可作糾王用，此趙氏所以樂於援引也，而“浮光掠影”、“脚跟未曾點地”之論，實中王氏要害。

〔4〕趙執信《談龍錄》有引金周昂的話一段曰：“余讀《金史·文藝傳》其定周昂德卿之言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按趙引周說，亦恰中王氏之弊。王氏所作實不免役強主弱，有時且反役其主。周氏所論“文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云云，尤與“思想性第一，藝術性第二”的理論相合。

〔5〕按今傳宋琬《安雅堂集》未刻稿卷五《題冒青若小像》詩有此句，作“絕代詩人王阮亭”。豈初稿作“消魂”，故招來袁枚之譏笑。據乾隆丙戌彭啓豐《序》稱琬曾手定詩三十卷，後因蜀亂入都散佚，康熙間重刻一本，迥非原書，則宋氏之詩有與原稿不同者，或經重刻改易，亦意中事。

〔6〕《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唐賢三昧集》提要）曰：“詩自太倉、歷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為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皆可成篇。於是士禛等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之。蓋亦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其後風流相尚，光景流連。趙執信等遂復操二馮舊法，起而相爭。”按太倉，王世貞，字元美；歷下，李攀龍，字子鱗，當時並稱“王李”。公安，袁宏道，字中郎；竟陵，鍾惺，字伯敬；譚元春，字友夏，當時稱公安體、竟陵體。是為明詩中兩大派。二馮，馮舒、馮班兄弟也。

〔7〕此如康熙二年的莊廷鑑因私撰《明史》，被吳之榮告發，謂其書多指斥清人之語，釀成大案，株連被殺者七十餘人之多。又如馮舒因編《懷舊集》，被人告發，謂其書中有譏謗清室之語，下獄，終亦被殺。此皆王氏親見親聞者，